

试论现代语文学科中文、 史、哲的分合*

戴元枝 张心科

摘要 现代语文独立设科之后,其中的文、史、哲的功能、地位及三者的关系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大致依次呈现出经史文章化、经史语言文学化、文史哲独立化的趋势。文、史、哲的分合与现代语文学科追求学科独立、强调实用功能、突出基础能力、关注学习主体的价值取向有关。语文学科在课程目标、教材选文、能力养成等方面体现的综合性,决定了文、史、哲融合的必然性。

关键词 语文学科; 文学; 历史; 哲学; 分合

作者简介 戴元枝 / 黄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黄山 245041)

张心科 /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上海 200062)

当我们讨论语文课程的分合时,多是讨论阅读与写作的分合、文言与白话的分合、语言与文学的分合,很少见到讨论文(文章、文学的读写等)、史(历史)、哲(哲学)的分合。似乎文、史、哲的分合不是问题,不需要讨论;或这不重要,不值得讨论。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虽然我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但是在语文学科中文、史、哲的地位与关系至今并未厘定;在当下提倡多学科融合(如美国的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综合教育)的大背景下更有讨论语文学科中文、史、哲分合问题的必要。尤其是在中小学语文学科不再将语文定位于一种工具学科,不再将本学科的任务限定在学会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而强调语文学科的综合性质。在倡导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形势下,这个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一、语文教育中文、史、哲的分合历程

(一) 传统语文教育中文、史、哲的融合: 文史哲一体化

传统教育是文、史、哲融为一体的。张隆华、曾仲珊在《中国古代语文教育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一般项目“明清时期徽州塾师研究”(项目编号:18YJAZH012)及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明清徽州族谱中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SK2018A0381)的阶段性成果。

史》中对传统“六经”教育做过分析,认为孔子关于“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的论断,其实就是把《诗经》《尚书》《乐记》《周易》《礼记》《春秋》这六部经典分别作为修养道德、陶冶性情,了解历史、通古今流变,涵养德性、完善人格,尽心察微、精通事理,恭顺俭朴、庄重威严,以史为鉴、知所损益的重要手段,而“这六种教材,实际上是集文、史、哲于一炉的大语文教材,是我国第一套比较完整的教科书,长期以来作为我国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1]。

定型于明清的科举教育也是文、史、哲不分的。即便是蒙馆阶段作为识字教材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是如此,明代吕坤在《社学要略》中称:“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2]近人张耀翔甚至称“《三字经》很像一部《儿童百科全书》。甚么学科都被它包括了”,如历史、教育、哲学、数学、天文、地理、物理、植物、动物、心理、艺术、文字学、课外讲演,除了体育、卫生,其他重要的学科都有。^[3]此外还要阅读《史学提要》《史鉴节要便读》等历史类书籍以及《弟子规》《小学韵语》等伦理学书籍。

经馆阶段所读的“四书”“五经”等同样如此。因为科举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精英以维持帝国的统治,所以所选拔出来的官员和绅士必须是道德的化身和文化的象征。其乡试考八股文和试帖诗,会试、殿试则兼考策论。策论包括经义策、史事策和时务策。八股文有特定的程式,其题目出自“四书”,材料来自“四书”“五经”及其历代注疏。只有熟记“四书”“五经”的内容,才能在写作时代圣人立言;熟读这些儒家经典,自然会将其内容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时,会写八股文和试帖诗等自然是有文化的标志。

(二) 现代语文设科初期时文、史、哲的分合(1902—1916年): 经史文章化

1901年禁八股,1905年停科举,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和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的实行标志着现代学科的设立。“学科”是19世纪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专业”人才的需求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意味着要对传统教育中的综合知识进行分类。“语文”要独立设科,就意味着其需要从传统蒙学中脱离出来,或者说,需要与其他学科划定边界。

《钦定学堂章程》中的“读经”及《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读经讲经”所规定的教材,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及其“三传”等。可见,“读经”“读经讲经”沿用的是传统蒙学的核心教材——“四书”“五经”。而且,章程规定了“读经”“读经讲经”的课程目的是“令圣贤正理深入其心”,“令圣贤之道时常浸灌于心”。^[4]与科举时代不同的是,此处读经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写作,而只是为了修身。其与修身科不同的是读经科读的是整本的经书,而修身科读的是节选朱子《小学》、刘忠介《人谱》等儒家经典或根据《论语》《孝经》及“四书”的旨趣自编的性理通论、伦常大义、先哲言行等。

此外,学堂章程中还出现了许多现代学科,如《钦定学堂章程》中的“功课

教法”所列的“课程”蒙学堂中有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和体操；寻常小学堂中有修身、读经、习字、作文、史学、舆地、算学和体操；高等小学堂中有修身、读经、读古文词、习字、作文、史学、舆地、算学、理科、图画和体操；中学堂中有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从其所规定的“功课”内容来看，和现代“语文”学科相对应的有字课、习字、读经、读古文词、作文、词章。《奏定学堂章程》的“学科程度及编制”中所列的“科目”，初等小学堂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和体操；高等小学堂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和体操；中学堂中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从章程所规定的“科目”内容来看，和现代“语文”学科相对应的有中国文字、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

除了清学部颁布各科课程标准外，1904年颁布的《新定学务纲要》规定，应选用京师大学堂编书处所编写的教科书。同年，京师大学堂颁布的《大学堂谨拟编书处章程》开列了编书处编订的拟着手编写的中小学教科书目录，目录中共有“经学”“史学”“地理”“修身伦理”“诸子”“文章”和“诗学”七种科目。比照《奏定学堂章程》中所列的科目可以发现，与现代“语文”科教科书相对应的有“经学”“诸子”“文章”“诗学”四种。^[5]

在学科草创期，教科书往往代替了课程，也是确立学科边界的重要依据。不过，清学部并没有立即编出相应的教科书。第一本小学国文教科书是1904年蒋维乔等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初等国文教科书》，第一本文选型中学国文教科书是1908年林纾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读本》。如果说其他各科教科书还可以直接翻译国外的教科书或仿照国外的编法，那么语文教科书既不能翻译西方的也无范本可仿。这两本教科书也就确立了现代语文学科的基本形态，其体例一直沿用到1922年新学制确立。

独立设科时期的语文教育目的与传统语文教育目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传统语文教育是培养精英（臣民），那么现代语文教育是培养平民（公民）。平民最需要的是各种生活知识和处世道理。所以，小学语文教育除了培养学生的识字、写字、阅读、写作等语文能力外，还要满足其日后成人世界生活所需，所以传授各种生活知识和处世道理就变得重要。清末民初的小学国文教科书如《最新初等国文教科书》等就基本上是由说明文以及用以介绍各种知识和便于传授各种道理的记叙文组成，很少有儿歌等文学作品。此时，历史虽然已经独立设科，但是其教科书主要是梳理历代史实。国文教科书中的历史，多是以人物故事的形式出现的，其主要功能是激发儿童的爱国意识。例如《教育杂志》的编者在“介绍批评”栏评介林万里译编的《少年丛书》时，就特别指出其选材虽是“圣贤豪杰之事迹”，但也有明显的不足：^[6]

不当纯用外国人物……我国人物，如苏子卿、班定远、张博望、诸葛武侯、岳武穆、秦良玉、沈云英、郑成功诸人，其行事确可为后人矜

式,而人之感情,对于本国之圣贤豪杰,固异于他国之圣贤豪杰,此所以不当纯用外国人物,而当采用本国史传也。

因此,清末民初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出现了从《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著中节选改编的《诸葛亮》《班超》等课文。

这一时期的中学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虽然当时科举已停、八股已禁,但是考试仍在,而考试主要是考一篇议论文。无论是《钦定中学堂章程》中的“词章”,还是《奏定中学堂章程》中的“中国文学”,都要求学生阅读经史子集以积累素材和技法,然后进行写作训练。清末的《中学国文读本》、《中学国文教科书》(吴曾祺编,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以及民国初年出版的《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刘法曾、姚汉章编,中华书局1912年版)、《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许国英编,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类似于古文汇编,都是作为写作教材使用的,这些教材不仅用选文作为写作的样例,还通过评点的方式揭示其写法。所以,其中虽然出现一些类似于科举时代的“经义策”“史事策”“时务策”的古文,也主要是作为学写文章用的,并不是作为研习经义、探究史实、理解时务材料使用的。如《中学国文读本》(许国英重订本)的“凡例”称“本书所选之文各类略备,使读者稍知其门径。”“门径”即写作之法。其第1册第1—6课是桐城派大家讨论义理、评鹭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古文《原人上》(方苞)、《李斯论》(姚鼐)、《范蠡论》(姚鼐)、《原才》(曾国藩)、《汉高帝论》(周树槐)、《伊尹五就桀解》(龙启瑞),只是作为学写论辩之文的范文。

民国初年,读经讲经科废除。“四书”“五经”在学校教育中的功能和形态再次发生变化。清末因为尊经,怕因为节选而破坏了经书的原义而提倡“全读”,而民初“四书”“五经”等经书在科举时代所具有的思想教化以及提供写作素材的功能消逝,其作为文章范文的功能开始凸显,所以当时的教科书中也出现了节选自传统经史子集四部的课文,如《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第1册的前30篇课文中,节选自经部的有《先进篇节录》(《论语》)、《民贵君轻章》(《孟子》)等9篇;节选自史部的有《突归于郑》(《左传》)、《召公谏弼谤》(《国语》)等15篇;节选自子部的有《尧让天下于许由》(《庄子》)1篇;节选自集部的有《楚辞九歌国殇篇》(屈原)等5篇。《中华教育界》所登该书的广告称其所具有的四个特色之一就是“经史诸子,悉择要采入,其余论说、序记、碑铭、书牘,及诗赋、歌词,无不搜采。各种文体具备”^[7]。除了“麝入诗歌”^[8]是为了涵养性情,宣导血气外,其他各体,无论经史,都用作学习文章写作的范文。此时,将原来属于“四书”“五经”的文本选入教科书,已不再视其为“经”而是视其为“文”,不是以学习其中的经义为主,而是学习其作为“传状”“论辩”之文的作法为主。又如1915年教育部颁布《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在“讲读文章”中列出了未来所编国定教科书的选文标准“文章分记叙(叙记典志传状碑志杂记皆属之)、论议(论说叙跋书牘奏议皆属之)、词赋(诗赋颂赞哀诔箴铭皆

属之)。三类选授,不拘时代,以清真雅正切于实用为准。《左氏传》《小戴记》《国语》《国策》,皆当选读。《史》《汉》《资治通鉴》,亦可采取。”^[9]其中提到的历史著作也是作为学写“记叙”类“文章”使用的。

1915年,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恢复读经,规定初小读《孟子》、高小读《论语》、中学读《礼记》,认为此科相当于国外的“宗教科”,其目的是“为道德教育计,为保存民族立国精神计”。又强调读史,认为好的教育在于“造成有机的国民”,国民要具备政治知识,尤其在列强竞争的形势下国民要有通权达变的政治思想,“中小学国文一科,实为输入此种知识之捷径”,尤其是政治史典籍应该教读,“《尚书》《国语》《国策》,不特文词古朴精微,可为文范,而经权正诡,无所不具,尤足发达思想,应由教育部通飭中小学校于编定国文教科书外,多读《国语》《国策》,并选读《尚书》。中学以上,并应于每日科学之暇,多阅《史》《鉴》,以增进其政治之知识”。^[10]不过,这些设想还没来得及完全实施袁世凯就驾崩了。

(三) 新学制时期的文、史、哲的分合(1917—1927年): 经史语言文学化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掀起了文学革命运动。1920年,教育部训令“国文”改为“国语”,规定从当年的秋季入学开始,小学改用白话教科书,文言教科书逐年废止。1922年实行新学制,1923年小学、初中、高中的国语课程纲要相继颁布。因为不要求文言写作,文言文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不再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文,而是作为学习文言词汇、掌握文言现象的语料来使用。小学和中学国语课程标准均强调“文学”阅读兴趣的培养,如1923年吴研因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规定国语课程目的是“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像力及思想力。”^[11]叶圣陶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及胡适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确定的课程目的中分别有“引起学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和“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12]。所以,当时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以儿童文学为主,中学则以新文学为主,按黎锦熙的说法,是“以文艺的眼光选辑模范文”^[13]。

在这一时期的文言选文中,文章只占选文总数的极少一部分,文学作品则占绝对优势,而且从其语体来看,多是浅显的文言,尤其是有些诗歌的用语接近古白话,甚至可以用“浅显有趣”四字来概括这一时期中学文言课文的选择标准。如范祥善、吴研因等根据《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编写的初中学用《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的第1册第4、5课分别是《孟子许行章(译文)》和《孟子许行章(文言)》,白话和文言对照,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些文言字词和现象。其他全部为文言的教科书中的选文也多是史传文学中节选的充满文学趣味的篇幅简短的作品,如1923年沈星一编写、中华书局出版、供初中使用的《新中学古文读本》第1册中的《苏秦止孟尝君入秦》《苏代说赵惠王》《田单以火牛破燕军》皆属此类。可见,从这些历史著作中节选的课

文,并非作为学习历史的文本。

同理,所节选的宋儒语录之类也不是作为学习哲学的文本,而只是作为学习白话的材料来使用。如1924年吴遁生与郑次川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读本《古白话文选》(上册)第二类“语录类”就收录了《明道先生语录》《入关语录》《张载语录》《象山语录》《严泽讲义》《朱子语录》《阳明传习录》《呻吟语节录》《菜根谭》《莲池大师语录》。这些语录与书中的书信、诗、词、曲、小说类一样,主要是作为学习白话的语料。

(四) 新标准及全面抗战内战时期的文、史、哲的分合(1928—1949年): 文史哲独立化

随着多年的实验和讨论,20世纪30年代前后人们对语文学科的认识渐趋成熟。同时,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推行“党化教育”,主张以三民主义施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语文学科认识的深化,国民政府教育部相继于1929、1932、1936年颁布了中小学国语、国文课程标准,各书局据此而编写了多种教科书,共同对语文教育进行持续地调整。

这一时期对语文教育中的文、史、哲的看法和做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学和中学都反对纯粹的审美教育,强调课程的综合。小学国语课程目标又向“启发智德”回归,新学制时期“小猫跳,小狗叫”之类所谓“无意思之意思”“无用之用”的教科书受到抨击,新学制时期以及全面抗战内战时期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课文虽然仍是儿童文学作品,但是题材和主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出现了各种实用知识,二是加强了思想教化,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影响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如1941年颁布的《小学国语科课程标准》的课程目标中除了有培养儿童语文能力和审美观念的条文外,特别提到“培养儿童修己善群爱护国家民族意识和情绪”。在教材内容范围中特列“关于民族国家的”一项,如第二学年是“有关民族英雄及爱国故事的”;第三学年中有“有关国父和中华民国成立的史事的”,“有关黄帝、大禹、孔子、秦始皇等的故事的”,“有关文字的创造和蚕丝、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的发明故事,长城、运河等的建设工程的”;第四学年中有“有关国民革命的经过、蒋委员长和民族复兴的故事的”,“有关汉武帝、张骞、班超、唐太宗、岳飞、元太祖、郑和、戚继光等民族伟人故事的”,“有关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的史事的”等。^[14]国语教科书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如国立编译馆编写、1943年出版的《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的第7册前10课的“常识”为《汉武帝和唐太宗》《岳飞》《元太祖》《郑和》《明代的倭寇》《甲午战争》《日本的侵略暴行》《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国民革命的经过》,“国语”为《张骞/投笔从戎》《拐子马》《拔都西征》《侨胞之功不可忘》《戚家军》《一门忠烈》《卢沟桥/抗日阵亡将士墓》《庆祝国庆的演说稿》《建国歌剧》《忠勇威武的国民革命军》。无论是课标的规定,还是教科书中的课文均涉及历史,有古代有当代,有伟人有领袖,有国粹有国耻,其目的不言

而喻。

在小学国语加强历史教育的同时,中学(尤其是高中)国文为了体现民族主义、突出传统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进行传统史学和哲学(思想)教育,因为历史和传统哲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1932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课程目标的第一条是“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的文化,以培养其民族精神”,要求课外阅读“中外名人传记及有系统之历史记载”,“古代语录及近人演讲集”等,^[15]涉及历史、哲学。同年颁布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课程目标第一条为“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的文化,以期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在“教材大纲”中规定,“文言文第一学年以体制为纲;第二学年以文学源流为纲;第三学年以学术思想为纲;各授以代表作品”。^[16]其中的“学术思想”就包括历史和传统哲学。也就是说,高中三年应在初中的基础上学习文章体式、梳理文学源流,进而探究思想文化。

1933年,杜天縻与韩楚原根据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而编辑的《杜韩两氏高中国文》由世界书局出版。其第5册共分为“中国学术之渊源”“先秦哲学”“先秦政治”“先秦经济”“先秦教育”“先秦史学”“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汉杂家”“汉经济”“汉史学”“汉经学”共16组;第6册分为“文字学”“魏晋六朝间老学”“南北朝佛学”“唐儒学”“宋理学”“宋史学”“明理学”“清初朴学”“清哲学”“清末今古文学”和“近代学术思想”(一)(二)12组。每组分为“基础教材”(论著)和“范文”两部分。基础教材或梳理思想的源流,或评述思想的要点;范文则呈现基础教材所论原著。如第5册第一组“中国学术之渊源”的基础教材是《四库提要总叙》、《论六家要旨》(司马谈)、《周秦之际之学派》(夏曾佑)、《书艺文志后》(张裕钊),范文为《汉书艺文志》(班固);第二组“先秦哲学”的基础教材为《易类总叙》(《四库提要》)、《易教》(章学诚)、《易论》(章炳麟)、《大学章句序》(朱熹)、《大学格物说》(阮元等),范文是《乾文言》(《易经》)、《大学首节》(《礼记》);第八组“儒家”的基础教材是原儒(章炳麟)、《论语辨》(柳宗元)、《孟荀论性善恶说》(焦循)、《荀卿论》(马其昶)、《读荀子》(陈三立),范文是《论语》(鲁迅)、《与告子等论性》(孟轲)、《性恶篇》(荀况)。

与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出自“四书”“五经”中的选文是作为古文(散文)写作的范文以及选自桐城派的文章常作为史论、策论写作的范文不同的是,这5、6两册中的选文,无论是基础教材还是范文,都不是作为写作的范例来使用的,而是作为了解及研究古代历史、哲学等材料来使用的,如其编辑大意称“第三学年,更附述其时代背景与思想中心,俾学者得深切正确之认识。”该书还将“四书”“五经”按现代学科进行重新分类,即便是对同一本书也按其内容所涉及的不同学科重新分类,例如出自《礼记》中的《大学首节》《大同与小康》《学记》就被选作“先秦哲学”“先秦政治”“先秦教育”中的范文。

这一时期,与《杜韩两氏高中国文》编辑旨趣相同的还有《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高中国文》《高中国文选》两套教科书。《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高中国文》是1931年徐公美等编注、南京书店出版,其第5、6册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法选择代表性作品,经部包括《毛诗》《孟子》等,史部包括《通鉴》《通考》《明儒学案》等,子部包括《荀子》《庄子》等,集部包括《楚辞》《文选》等。第5册的“说明”称“温公《通鉴》,为纪传体盛行后一大创作,故选录二则,藉示梗概;至《通典》《通考》,于历朝典章沿革,叙述最详,而梨洲《明儒学案》,则为我国学术史极精之作,录其序言,庶足为进窥全书之助”,“子部为我国古代思想所寄,凡治学者宜略识其源流,本期选录儒家之《孟子》数篇,并就《战国策》采取纵横家言,以为下学期研究子部之导”。《高中国文选》是1934年姜亮夫选注、北新书局出版,编辑大意称“本书虽以周秦诸子为主,凡文学史上之名著,亦大体具备。此外如司马迁、王充、刘知几之于史学,刘勰之于文学,议论精湛,亦选录甚多”均注意文、史、哲的配合。

可见,与前几个时段语文科内的历史、哲学只是学文的材料相比,这一阶段的历史、哲学已经部分独立出来,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其中的史实、思想。而1949年之后,语文学科中文、史、哲的各自功能、相互关系及基本形态并未超出上述所论范围之外,不再赘述。

二、现代语文学科的基本取向与文、史、哲的分合

语文学科中文、史、哲的各自功能、相互关系及基本形态与政治形势等外在因素变化有关,更与现代语文学科发展的基本走向相关。现代语文学科发展中四大基本取向,直接影响了语文学科中文、史、哲的各自功能、相互关系及基本形态。

(一) 追求学科独立

1902、1904年学科初设时期,“语文”是一个学科群,这一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章程的制定者并不清楚。商务印书馆确立的小学国文旨趣和传统的蒙学差异不大。主要是在识字、写字以及初步的读、写的同时学习各种知识、接受伦理教化。不过,中学国文教科书却将此学科窄化成写作学科。相应的,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哲学的文本,主要都是用来作为学习文章写作的范文(经史文章化)。新学制前后,历史、哲学的文本更是作为学习文言或白话的语料以及涵养性情、培养阅读兴趣的材料(经史文学化)。此时,中学国语科进一步被窄化成审美学科。新标准前后,当国民政府推行“三民主义”,尤其是全面抗战和内战期间,政府借要求继承传统文化以凸显民族主义教育时,一些语文教育研究者将这一学科确定为“形式”的学科,即认为语文学科和历史、地理、公民(哲学)不同的是此学科重在学习文本形式而其他学科重在学习文本内容。如夏丏尊、叶圣陶在介绍他们合编的《国文百八课》时说“这是一部侧重文章形式的书,所选取的文章虽也顾到内容的纯正和性质的变化,但

文章的处置全从形式上着眼。”他们还批评了新学制时期按主题组织单元的教科书以及上述新标准时期传授“学术思想”之类的重视内容的教科书“时下颇有好几种国文课本是以内容分类的。把内容相类似的古今现成文章几篇合成一组 题材关于家庭的合在一处 题材关于爱国的合在一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科的立场。”^[17]他们和同一时期多种“知识+选文”型教科书的编者一样 将语文进一步窄化成传授文本形式知识的学科。

(二) 强调实用功能

传统以读经书为主的古典教育被视为崇尚虚无、高谈心性的空疏无用之学,不能满足当下的需要,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如郑观应嘲笑传统士子熟读“四书”“五经”但是不辨菽麦,更不懂动物、物理等现代学科知识。以实用性、当下性为表征的现代教育(包括语文教育)对传统多持否定的态度。1917年,陈独秀在南开学校的一次演讲中称“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18]语文教育自然不能例外。1915年,教育部整顿教育时指出“中国国文受八股策论之余毒,蔓延流传,至今未息”,“学校宜置国文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格外注重,尤以适用为主”^[19]。1924年,沈仲九在讨论中学国文教授时说“中学生是否只要了解现代的思潮。我以为中学生的在学年限不过三年,而应备的知识,种类很多,就轻重缓急权衡起来,只要能了解现代思潮,对于他的对付环境的生活一方面却已很有利益了。”“与其叫他读《庄子》《墨子》《荀子》等,不如叫他读《胡适文存》《独秀文存》这一类书;因为一则难懂,一则易解;一则未必适合于现代思潮,一则可以当做现代思潮的一部分的代表。就轻重缓急论,要做一现代的人,不懂《庄子》《墨子》等的学说,却不要紧;不懂国语文提倡的理由,不懂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礼教问题、劳动问题等,却是要做一时代的落伍者。”^[20]因此,在1923年他和孙俔工合编、民智书局出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中就没有也不会出现有关传统历史、哲学的课文。

(三) 突出基础能力

中小学语文学科一直强调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进入语文教科书中的历史、哲学文本首先是被视为培养语文能力的材料的。如1936年胡怀琛在《中学国文教学问题》中针对“读经”的问题发表看法时说“中学以上的国文课中,虽没有‘读经’的名称,然教员们你选一篇《孟子》,他选一篇《礼记》……所读的何尝不是‘经’!明明有读经之实,何必在空名上多所计较。”^[21]不过,中学国文教材中的“经”和“读经”科中所读的“经”虽然对象相同,但是其地位和功能发生了改变,这些“经”进入中学国文教材之后,已蜕变成一般的“文”,其主要功能也由全为思想教化而转变为用以训练读写能力。同时,对历史,尤其是对哲学文本内容的理解被视为高深学问,所以上述20世纪30年代直到高中三年级的国文教科书中才出现作为专门研习“学术思想”

之用的历史、哲学文本。

(四) 关注学习主体

编者在编选教科书中的课文时,既要考虑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又会考虑其学习兴趣。对历史、哲学经典文本,编者会考虑选还是不选、选哪些、如何呈现等问题。如上述1931年出版的《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高中国文》第5册的“说明”称“经传之文,恒苦奥博,非初学所可猝能,今之所选,仅以富有文学意味者为准,故于经只选《诗经》,于传只选《左传》及《礼记》,不涉其他。”又如虽然1942年朱自清在《经典常谈》的序言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22],但是其在书中对《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书》《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诸子辞赋等文、史、哲经典,也只是作概要式的介绍,以让学生了解经典的概况,而非研习原著。

三、语文学科的综合性与文、史、哲融合的必然性

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界定“课程性质”时称“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接着从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的角度进行分析,除了强调培养语言的理解与运用的能力外,还要求“发展思辨能力,提升思维品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理解文化多样性”^[23]。课程标准突出了语文学科的综合性的特征,强调了语文核心素养的不同侧面,都与历史、哲学等学科相关。下面,再从语文课程目的、语文教材形态和语文能力的养成三方面来探讨文、史、哲的关系。

(一) 语文课程目的的肩负与其他学科共同的责任

除了20世纪20年代初学术组织全国教育联合会委托吴研因、叶圣陶、胡适分别起草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国语课程纲要等少数语文课程标准在确定课程目的时专注于读写兴趣和能力的培养及涵养学生的性情外,绝大多数由政府机构组织研制并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大纲)在确定语文课程目的(或称“要旨”“目标”)时,都会在突出语文能力培育的同时兼顾意识形态的渗透。因为现代教育是由一定阶级和政党负责实施的,必然会体现其思想意志。最能体现思想意识形态的学科,就是语文、历史和政治。因此,袁世凯当政时试图编写国文和修身两种统编教材,南京国民政府编写出版了国文、公民和历史三种统编教材。语文作为中小学诸多学科中的一种,必然要承担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教育的责任。

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为了抵抗思想意识形态对语文学科的渗透,一些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强调培养听说读写能力才是语文学科的“专责”,认为思想、审美教育以及各科知识教育是“兼责”,是与其他学科共同担负的责任。如1934

年阮真在《中学国文教学目的之研究》中将“了解现代思潮的大概”和“启发思想或发展思想”排除在中学国文课程目的之外。他说“惟于了解人生真义,社会环境,及现代思潮各条,赞同人数虽多,亦不採入,以其为教育的目的而非国文科教学之特有目的也。”^[24]又如1940年叶圣陶在《对于国文教学的两种基本观念》中说“如果国文教学纯粹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不再含有其他意义,那么,任何书籍与文篇,不问他是有益或者有损于青年的,都可以拿来作阅读的材料与写作的示例……国文教学自有他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25]。不过,“兼责”毕竟也是“责”,如果都不去承担,那么整个教育目的如何达成?所以,只关注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试图将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历史、哲学排除在外的认识,显然忽视了中小学语文课程是特定的阶级、政党根本意志的一种体现的重要特点。

(二) 语文教材的选文涉及各科内容

目前的语文教科书仍然以文选为主,选文的内容必然会涉及历史、哲学等学科的知识。如果说学校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利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生活,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读、所写的肯定不是纯美的文学作品,而是会涉及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文章和著作,语文教材中的选文相应地应该是这类文章。

无论是将选文作为阅读的材料,还是将其作为写作的范例,通过教学以提高学生的阅读或写作能力时都会涉及对文本的旨意、内容和体式理解或表述,如果教学只从这三者中的某一方面入手,都难以奏效,只有将三者综合起来,才能使学生在阅读时全面深入地理解文本,在写作时准确恰当地表达信息。提出“六经皆史”命题的章学诚就在《文史通义·原道》中明确反对治学时立门户(“分其门户”)、定主次(“因宾定主”)、分主次(“因非立是”),他认为其结果是“特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如果我们把文、哲、史的范围简单地对应于文本的“章句”(辞章)、“义理”和“名物”(考据),那么“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26]。也就是说,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以及二者的教学,只有三者兼顾,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

(三) 语文能力的养成需要各种学科知识

语文能力的养成除了要利用选文作为训练的材料外,还要开展语文活动。任何听说读写活动的开展必须依靠具体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必然涉及多个学科。如果没有内容,活动根本无法展开,就像1926年有人说的,“若无内容,虽欲听、欲说、欲读、欲写;将何听、何说、何读、何写乎!”。没有内容的纯技能训练,好比“耕夫不耕而频动其犁,织女不织而屡投其梭,其使用工具虽勤且劳,曾未得使用工具的效果”^[27]。可见,听说读写技能的训练不能凭空进行,必须借助于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内容。

更何况,其他学科的知识越丰富,听说读写的的能力往往越高。现代教育心

理学反对抽象的能力而提倡具体的能力观,认为个体的能力高低往往与其掌握的知识多少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拥有广博的陈述性知识(相当于内容性知识——引者),能促进阅读过程中词的解码、词义的提取及语句的整合。”“作者长时记忆中的陈述性知识对写作质量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具有同等写作技能水平的人,如果对文章主题所拥有的陈述性知识不同,写出的文章就会有较大的质量差异。”^[28]也就是说,个体所拥有的文、史、哲等学科的陈述性知识越丰富,读写能力往往越强,否则越低。熟悉“晋公子重耳之亡”及“晋楚城濮之战”史事的读者与对此毫无所知的读者在阅读《烛之武退秦师》时对文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熟知传统儒家哲学的人读冯友兰的《人生的境界》其感受与不知生命哲学人读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个体写作能力的高低也与其所拥有的与文章相关知识的丰富程度相关。所以,从语文能力的养成的角度来说,也需要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支撑。

以上梳理了现代语文发展历程中文、史、哲三者的功能、关系及形态,并探讨了其与现代语文发展追求学科独立、强调实用功能、突出基础能力、关注学习主体性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语文学科的综合性决定了文、史、哲融合的必然趋势。

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语文核心素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在课程目标中提出要“发展逻辑思维”“传承中华文化”“关注、参与当代文化”,并设置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当代文化参与”“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研习”“科学与论著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习”“学术论著研习”等学习任务群^[29]。经典的文学、历史、哲学文本无疑将成为学习的对象。不过,其课程目标如何确定?是作为训练一般语文能力的材料,还是作为训练思维、传承文化的材料?教材如何编写?是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在高三年级作为必修教材,还是像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做法那样,既编写以训练一般语文能力为主的《语文》教科书,又编写供选修用的《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先秦诸子选读》(2006年版)等专题教材?专题教材是以节选原著加少量的导读文字的形式呈现,还是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以研究论著和原著节选的形式呈现,还是用原著(“整本书”)的形式呈现?还有怎样教学?如何评价?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38-39.
- [2] 陈宏谋.五种遗规[M].北京:线装书局,2015:74.
- [3] 张耀翔.六百年来最有势力的小学校教科书(续)[J].新教育评论,1925(4):16-19.
- [4][11][12][14][15][16]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8,13,274-277,40-44,289-290,293-294.

- [5] 佚名.政书通辑卷四(光绪二十八年):大学堂谨拟编书处章程[Z].政艺通报,1902(9):8-9.
- [6] 佚名.介绍批评:少年丛书[J].教育杂志,1909(1):2.
- [7] 佚名.广告: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J].中华教育界,1914(13):159.
- [8] [13] 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J].师大月刊,1933(2):1-23.
- [9] 佚名.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J].教育研究,1915(24):40-45.
- [10] 佚名.大总统特定教育纲要[J].中华教育界,1915(4):1-12.
- [17]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77-179.
- [18] 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J].新青年,1917(5):1-4.
- [19] 佚名.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J].教育研究,1915(20):1-16.
- [20] 沈仲九.中学国文教授的一个问题[J].教育杂志,1924(5):1-13.
- [21] 胡怀琛.中学国文教学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6.
- [22] 朱自清.经典常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
- [23]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14-10.
- [24] 阮真.中学国文教学目的之研究(续)[J].中华教育界,1934(6):13-24.
- [25] 叶绍钧.对于国文教学的两种基本观念[J].中等教育季刊,1940(1):13-17.
- [26]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册)[M].罗炳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189.
- [27] 吴贯诚.小学校的国语教学[J].小学教育月刊,1926(4):1-6.
- [28] 吴庆麟,等.认知教学心理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263-277.

On the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Literature , History , and Philosophy in Modern Chinese

DAI Yuanzhi & ZHANG Xink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 Huangshan University , Huangshan , 245041 , China;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062 ,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discipline, the function, statu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re distinct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In general, modern Chinese successively presents as the classics and history in the form of article, classics, and history with 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 and independent disciplines. The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re related to the rationale of modern Chinese: discipline independence, practical function, fundamental ability, and learning subject.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Chinese discipline in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goals, textbook selection,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determine the necessiti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Keywords: Chinese discipline; literature; history; philosophy; the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责任校对: 田张珊)